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介於抵抗與治理性之間的集體記憶

La Mémoire Collective Entre Résistance et Gouvernamentalité

doi:10.6752/JCS.200803_(6).0010

文化研究, (6),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 2008

作者/Author : Alain Brossat;邱德亮(Der-Liang Chiou)

頁數/Page : 244-25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8/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3_\(6\).0010](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3_(6).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思想翻譯

《文化研究》第六期（2008年春季）：244-253

介於抵抗與治理性之間的集體記憶*

La mémoire collective entre résistance et gouvernementalité

Alain Brossat

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教授

邱德亮 翻譯

Der-Liang Chiou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集體記憶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被統治者（或他們之中的部分）用來對抗權力濫用，以及國家和政治所犯的暴力罪行之方法？當代諸多情境都讓我們做如此想。為此，我個人有機會在1980年代，曾非常認真地見證了東歐和蘇聯國家集體記憶形成的方式，就如同諾哈（Pierre Nora）《記憶場域》（*Les lieux de mémoire*）裡所說的安置於**記憶場所**（*milieux de mémoire*）和具有特定用意的權力遊戲賭注之結晶，其中就以與政治行動直接相互作用而導致後史達林體系的崩解，最持久也最關鍵。比較近的例子還有1990年代末，我有機會見證了智利與阿根廷軍事獨裁政權時代的消失者問題，如何像操作器或觸媒一樣作用於整體的政治變動——這並不只是以俗稱「回歸民主」這類制度性詞彙可以命名，而且也非常明顯地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傅柯(M.

* 本文曾於2006年9月發表於阿根廷拉普拉達大學(Universidad de La Plata)歷史系所主辦的「歷史的記憶」研討會。

Foucault)的話來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在法國，我也同樣有幸（這次是以行動者和觀察者的身分）在2001年間因紀念阿爾及利亞人被屠殺案40週年的機會進行了考察。在1961年10月17日夜晚，發生了巴黎警察殺害阿爾及利亞人的駭人案件。'集體記憶及其重要性在此紀念會的場合成爲號召抗議者動員和反抗行爲最好的溫床，占據特定的社會場所以凸顯政治敏感度，也在此聚集了許多國會和當局以外的運動人士。如果你哪天經過巴黎的話，可以親眼看見此一動員的成果：一個經過激烈抗爭後獲得的小小紀念牌，安置於聖米榭爾橋(le Pont St Michel)上，與警察署和高等法院僅相隔兩步路，在這個具高度象徵意義的場所，銅牌上銘刻著國家犯罪的記憶。

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在當代的局勢裡，歷史記憶絕不僅僅是一個「場所」而已（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語），更是一系列社會／國家、有權／無權、上層人士／底層人士之間界線具有高度意義分配的操弄對象，同時在道德層面上，也是一系列記憶／遺忘、承認／否認、真實／謊言、正義／不公之間界線分配的操弄對象。在所有牽涉到這個問題的社會裡，對峙雙方的情感負擔是很明顯的，因爲此一對立的形勢，總是由涉及高度爭議的過去片段所造成的。「過不去的『過去』」依舊是燙手的山芋，建立起這種道德賭注的條件在於：那些爲了**回收記憶**(*recupération de la mémoire*)而積極活動的人，就像今日的西班牙，埋葬那些被佛朗哥政權(*franquistes*)劊子手殺害的共和黨人之萬人塚，無論就政治不公或道德責任上，明顯地都被視爲對抗健忘和消除犯罪痕跡的抗爭。遺忘在此一形勢裡是不道德的，而且不論是對抗遺忘試圖修補的一方，或極力想讓敗者的回憶重返現在而努力的一方而言，都是全然道德性的。

1 譯按：由於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移民群起上街頭示威，而遭到法國警察鎮壓，數百人被逮捕後，遭到毒打施刑後丟到塞納河裡，這件案子雖經學者與各團體奔走，以紀錄片、目擊證人的證詞，公開討論會、紀念遊行等，要求政府承認國家暴力，抗拒集體遺忘。但除了2001年社會黨執政的巴黎第四區政府在出事地點的塞納河右岸橋上立碑之外，法國政府至今不談這段過去。

這類的問題意識，來自於我們之中大部分的人——不論是一般大眾還是知識分子——自發形成集體記憶的賭注，往往都是由國家、政府、行政機關和其他機構自然趨勢下所滋養出來的，以便抹除由這些當權者的代理人在或近或遠的「過去」裡，所犯下罪行的痕跡。因而暴露出其向來的習性：或是當局者拒絕承認應該負起責任（例如1945年以後的法蘭西共和國，長期以來拒絕負起維琪政權〔le régime dit de Vichy〕所犯下的罪行），或是對過去行為的犯罪面向進行有系統的否認（例如當今日本政府對皇軍在1937到1945年間在中國和其他地方大量戰爭罪行的否認）。因此，必須堅持的想法是：遺忘在此就是罪行的延長，在大屠殺和清除異己的案子裡，甚至可以視之為消除痕跡的延續，積極和有意的追殺，**無止盡的持續犯罪**。

然而，令人憂心的是，在此我們遭遇到一個場景：我很願意這麼說，這實在太美以至於令人相信這是真的，也實在太簡單而令人無法理解今日集體記憶的種種問題，包括國家犯罪的關係。就以盧安達(Rwanda)的案子來說，你們將會看到它所顯露出來的場景遠比我到目前為止所描述的更複雜許多。在1994年的大屠殺問題上，即使社會中一大部分人都涉入，但國家的記憶卻是分裂而且彼此對立：一邊是「遺忘派」，站在第一排的就是從那時候以來前後任的法國政府，不遺餘力地抹滅它在這場大屠殺罪行中應有責任的痕跡，甚至企圖說是盧安達人之間的相互屠殺，而不像一般所說是殺害圖西族(Tutsis)²

2 譯按：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比利時人將盧安達交給聯合國代管，聯合國於是幫助盧安達成立自治政府。在自治政府的初期，圖西族仍然占有了大部分的政治資源；但是在1959年，一連串的革命行動讓整個盧安達的政治版圖倒轉，胡圖族(Hutus)取得絕大多數的政治領導權，圖西族反而成為弱勢族群。兩個族群間的新仇舊恨使得盧安達的政治非常不穩定，內戰似乎一觸即發。1990年，兩族之間的緊張情勢終於爆發，圖西族民兵與胡圖族的政府軍展開了一連串的戰鬥。這場盧安達內戰並沒有持續很久，在1992年兩邊達成停火協定，雙方暫時休戰。1994年4月7日，盧安達總統哈比亞里瑪納(Juvénal Habyarimana)的座機被不明的飛彈擊落。胡圖族的極端分子迅速掌握盧安達政權並且宣布圖西族是刺殺總統的元兇。胡圖族極端分子於是號召全國的胡圖族人將圖西族「一舉滅絕」。三天之內，超過三萬名圖西族人已經被這個滅絕行動所滅絕。（轉引自「風沙星辰」網站：<http://pushih.com/?p=126>）

的大屠殺，用以混淆視聽；另一邊則是「紀念派」，甚至可說是極端活躍和有系統的國家「紀念派」，當前的盧安達政府，不論是自稱為「受害者黨」的代表還是推翻屠殺者政黨的力量，不停地要將大屠殺的記憶一筆勾消。儘管脈絡不同，但方式相同，我們可以說種族隔離的記憶作為政治合法化的因素，已經在今日的南非轉移到政治當權者、國家的那一邊——其居首者，正是昔日非洲民族議會(ANC)的領導人和反抗勢力的歷史人物。因而，在此最重要的是理解：在上述以及其他例子中，國家罪行和極度暴力的記憶如何進入現行政府的運轉之中，並成為治理性(gouvernementalité)整體建置的組成部分（傅柯意義下，特別是指**警治安全、領土、人民**）。

但是，我認為恰恰非常獨特的是在古老民主國家的西歐，到處可以察覺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利用記憶的治理**(le gouvernement à la mémoire)的新形式（而非**記憶的治理**〔de la mémoire〕，就如同威權或極權國家所施行的）正在全面擴張並正在實驗著各種新伎倆與建置布局。令我非常震撼的是，像法國這樣的國家，經歷了幾十年來的各種事件，集體記憶的基調竟然是轉了一大圈之後又回到原點。1970年代，在難忘的六八事件衝擊之下，集體記憶以編列「底層聲音」、消失的文化、敗者世界為主調，是爲了紀念那些所有消逝無痕的無數人類，亦即傅柯所謂的賤民、「卑賤的人」。是爲了抗拒國家以愛國情操的儀式和官方紀念活動所進行的「古董商式」的記憶，因而發起一種「改革再生」的記憶，旨在重拾起那些在國家與階級歷史的人民面向裡，被壓抑者、被否認者無數的回憶，此一面向很明確地是完全背反於國家主義。此時正值出版社扮演著地震紀錄器的時代，馬斯培羅(François Maspéro)正好推動並主編了一系列命名爲「**人民記憶與行動**」的書系。

然後，漸漸地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偏向當局者的扭曲，國家、機構都紛紛進入「權力遊戲」，鼓動集體記憶作為製造一種新型態聚集人群的有效工具，這種新型態的聚集是爲了紀念難忘的勝利、英雄戰士、國家光榮時刻（7月14日〔國慶日〕、11月11日〔一次世界大戰終戰日〕、5月8日〔二次大戰勝利日〕等等），我不得不以**愛國情操**

的紀律命名之。然而，在此奏弦的凱歌裡，又有兩種新的旋律特別刺耳：其一是輕柔(soft)、節慶式的後－民族(post-nationale)動員，發起一連串娛樂性質和享樂主義式，但令人感到空虛的活動，像是紀念1789年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但是在此所紀念的畢竟是揭開不平等抗爭範例的時刻，同時也與上述活動性質南轅北轍，是一個哀悼的記憶，攸關過去犯下不義行為、罪大惡極的種種人物，以及被置替成英雄或殉道者之受害者，躍居成為「過去」的敘事故事的中心人物，環繞著這些英雄或殉道者之受害者，我們這些活著的人被召喚而聚集。

在「後－民族」的形構裡，亦即「我們的國家」（按照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說法），在西歐以揭櫫愛國情操的記憶治理大眾，但同時以進步分子、辯證關係和烏托邦的感覺來治理，現在變成窒礙難行，它**甚至是不合時宜的**(l'inactuel même)。如果法國人不願11月11日或5月8日被剔除於國定假日之列，一點也不是因為出自於他們強烈的愛國情操，沒那麼高尚，只因為它牽涉到**放假日**——並不是因為這些都是歷史重要日子，而是為了「社會既得利益」。因此，在此條件下，我們從集體記憶的古典形式，亦即現代國家想辦法據此要營造出民族認同並鞏固愛國主義的共識，過渡到**利用記憶的治理**，是一種比較有彈性、有變化、有差別的治理，也同時是一種調節型態勝於紀律型態的治理。

就以其輕鬆的調性來看，人們突然回過神來驚覺「過去」終究只不過是一些日期、行動、人物、地名和物件等取之不盡的貯藏庫，它們基本上都具有某種（如里格爾〔Alois Riegl〕所說的）**古老價值**(valeur d'ancienneté)，因而**值得紀念**。我們因此進入永久紀念／慶祝的時代，以一波又更勝一波的韻律強迫著我們，從此為年曆的復返所苦。在這個時代裡，平反德烈弗上尉(capitaine Dreyfus)百年慶正掩蓋了某個流行歌手的逝世週年日，慶祝廢除奴隸制度讓我們忘卻慶祝彩色電視或電動咖啡機的發明，所有的這些都處在一種典型後－歷史的冷漠狀態中。支配這種記憶樂觀化模態的主調是輕柔悅耳的聲音，「過去」不斷地被慶祝著，就像進入阿里巴巴的洞穴去擷取那些可資紀念的物品一般，寶山太豐富了，而且一件比一件更精彩。這類密集

耕耘「過去」所激起的動員具有典型的後一政治性質：逼真的「事件」在完全不相關的時間線上前仆後繼，彼此之間卻沒有關係，支離破碎的記憶夢遊式地在「過去」這個古董店裡移動著。

這是一種文化和保護消費主義的模式取代政治權力遊戲的集體記憶，其中曾經令人不悅的分裂與衝突的記憶現在都被潛抑了，以便毫無異議的販售另一種「回憶／紀念品」：T-shirts、鑰匙圈、「百年紀念酒」等等。再也沒有比最近紀念平反德烈弗上尉百年慶更能表現這樣的紀念體制——無憂無慮、去政治化，且又毫無異議的高度共識。然而，德烈弗案卻曾經是讓當時的法國社會分裂的傑出事件，百年之後，不再有任何異議的聲音來擾亂國家最高當局井然有序地組織紀念儀式和行禮如儀般的百年慶。在此例中，我們看到輕鬆、去戲劇化、令人感到空虛的紀念活動時代的來臨，它如何從中操作爭議性的**道德轉移**(transfert de moralité)：國家在此案中原是罪惡滿盈，卻在百年之後搖身一變成爲道德清高的角色，變爲「教訓」這一連串國家嚴重失職的訓導者與突然從集體記憶覺醒的掌門人。從此我們進入一個身段柔軟的體制，太過柔軟甚至到了滑頭的地步。政權當局自此將掌握最主要的部分——「過去」敘事的整體導向，並擁有「敘述者」的位置。具體而言，就是稀釋過去古典時代國家／官方民族歷史所形成的濃密敘事之負擔。兩相對照之下，強烈的對比足以震撼人心：一方面是像法國這樣的國家所建立起對紀念活動非常有彈性的體制，使得政治權力可以將「過去」的歷史敘事的核心部分下放給負責編撰中小學課程教科書的專業人士、歷史學家和教師們；另一方面則是像日本這樣的國家，紀律體制依舊占據主導的地位，其所產生的重要效應在於，每過一段時間就會針對教科書如何敘述日本皇軍在二次大戰期間的種種罪行而出現嚴重的衝突。

這些例子很自然地會引領我們，朝向我很樂意稱之爲利用記憶的治理之**沈重哀歌**。對我們來說，西歐國家確確實實處在一個過渡的時代，從過去民族歷史的政權過渡到歐洲歷史的政權，使得民族認同的形勢強度消退，剛好有利於強化對於災難、極度暴力和大屠殺的敏感度。基本上，我們經常碰到要求我們回憶的指令，並不是因爲我們

是歐洲人，而是因為我們居住在一個我們稱之為後－奧許維茲(post-Auschwitz)世界的後－浩劫空間裡。因為此一情況，所以在集體敘事和記憶的權力遊戲裡，民族英雄的名號讓位給那些受害者。

以下是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一個例子：在德烈弗上尉紀念會舉行前的幾個月，就有請求將其骨灰移至萬神殿的聲音出現。當時總統府基於各種理由並不支持，最後還是由在野的社會黨人士、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任內的前司法部長巴丹戴爾(Robert Badinter)出面才解決。巴丹戴爾因在法國推動廢除死刑而享有盛名。他以充分的理由為此一爭論作了決斷，他在報紙上這樣寫道：「萬神殿是接待英雄的」；但是「德烈弗案的英雄是左拉」；德烈弗上尉「本人是受害者」。然而，就是為了這位受害者，群眾被召喚而群起抗議，他所有的不幸只因為是猶太人，其冤獄所顯示的正是當時極權政府所進行的殲滅，發生在他身上或其他猶太人身上的種種不幸。但法國現在卻想盡辦法紀念，在這次紀念場合裡，總統特地親口向這位受害者致意，席哈克(Jacques René Chirac)在其逝世百年紀念會上說：「由於德烈弗事件，法國所奠定的價值得以往下植根、往上發展。」

法國把自身的罪加諸在一個無辜者身上造成了無限傷害，藉著慶祝對傷害的修補能力來誇耀自己不斷改革的能力，將誇耀正義精神與對真相的關注建構在狹隘國家理性(Raison d'Etat)概念上。我們可以在此看到：「過去」是如何在總統身上被建構成一面折射鏡，面對群眾顯現出其道德清高的模樣，席哈克這麼說：「權利和價值必須永遠被捍衛」。

群眾高度共識的聚集是環繞著受害者而形成的，讓他們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黑暗的「過去」形象而非燦爛的「過去」，記憶的政治或利用記憶的治理所採取的手法絕對是倫理性(éthique)的，倫理因此就應該扮演號召集結者的角色而不是製造分裂者。昔日愛國情操的感動是將軍隊的豐功偉業、輝煌的勝利和悲慘的敗仗編織於令人慷慨激昂的記憶中，也編織於使其不屈不撓的**特異性**(singularités)——民族驕傲的意識之中。但是，後－浩劫的感覺或敏感度則是一種深沈憂鬱的印記，無止盡地遊蕩於「絕對的惡」這個無解難題之謎的四周——為

何人類竟然會加諸那麼多的苦痛於其他人類身上等等？於是，取代民族、宗教或倫理特異性的殘忍儀式，將是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歷二十世紀大浩劫的種種記憶之後，所湧現的一股令人悲痛而卻無法撫平的悲天憫人之普世浪潮。

作為治理性權力遊戲賭注的集體記憶到底往什麼意義或什麼方向強化？在國家／民族的古典時代，集體記憶的治理集中於兩個面向：主權和民族認同，而且是以學校和軍隊為基本向度。在像法國這樣的國家，除了在幾個議題焦點以外，其他大部分的集體記憶僅出現在一大群獲得大學和高中教師資格者的圈子裡，一個對獨特「過去」敘事意見紛歧的場域，而且很少會被當權者的論述所影響。但在後一民族和後一浩劫的時代，在一種逼真的後一歷史(post-Histoire)中，集體記憶愈來愈傾向成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裡，一種全面性的權力遊戲賭注。統治者的治理愈是能放手不對未來施予魔法來動員的話，「過去」就愈有機會變成替代的銀幕，且在此銀幕上放映的神話（由索雷爾〔G. Sorel〕所賦予的詞的意義）就愈有聚集並動員群眾的力量。其次，代議民主的古典範式愈是減弱，亦即提出解決分化或衝突的制度性方案，同時又不否認或逃避這種衝突的能力不再，那麼輿論民主、群眾民主就愈有機會盛行，其基本特徵在於一心一意想要形成一種異常、沒有組織的群聚，或多或少一致通過，但不需決議。在紀念活動中群眾聚集的巧合最能說明這種情境：不怎麼成形的群眾聚集著，被強度各異的情緒所帶動，他們也許是很平靜和有文化素養的人，也許是充滿活力和具有政治意圖的人，但全都是輿論民主亟欲感動的第一類人。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法國文化資產日(Journée du Patrimoine)的時候所出現的成千上萬參觀者，他們趁此機會造訪各式各樣的名勝古蹟，也向顯赫人物朝拜，接受聖禮儀式。這可說是某種文化消費的衝動，但骨子裡卻奠定了對一個永遠更模糊、更不明確的文化遺產認同的堅實基礎。

就我們一直所援引傅柯的話來說，在促成這種當代紀念式的教區（或牧場）(pastorat mémoriel contemporain)擴張的諸多因素之中，我還想要提最後一個因素：即是社會國家(l'Etat social)的摧毀，以至於

它在當代民主裡，必須多多少少以粗暴且不可逆轉(*relèves*)的姿態出現，也勢必要在統治者爲了維持監控、看管、輔導及「追蹤」(*suivi*)人民生活之外，尋求另一種足以接替的方案，簡而言之，所有接替的方案不外乎是以「養活」(*faire vivre*)爲規劃目標的方案，而非像在前一個階段裡是以動員和調教爲目的，尤其是在以勞動者和生產者所主導的階段。社會國家向動員起來的工人承諾各種補償以便推行改革，而訴諸改革的動機曾是受控制的社會與政治發動衝突最有效的方法。

上述所描述的形象正是當前治理者的形象，愈來愈趨向於抹去治理性和新的程序措施所烙下的印記：對改革、對社會進步以及「社會夥伴」（雇主與工會簽約談判的雙方代表）之間規律性協商的治理愈來愈少，但對警治安全（對風險的恐懼和演習）、對管制身分不合法者的治理愈來愈多，這些身分不合法者主要是由於一部分勞動力遭到遣散以符合有「專職 / 忙碌」(*occupationnel*)的建置安排（彷彿休閒會使人作壞事！）；同時其治理手法也愈來愈是利用公司管理模式來對付社會模式（尤其善用那些無關痛癢的「改革」卻能夠讓人有不斷增加自由的假象，其中最經典的模式就是同性戀結婚）。

最後是**利用記憶**的治理。依據這個模式，「過去」成了一種主題公園，在此政府非常用心地以無窮變幻和「有意思」³(*intéressant*)的主題，不停地組織各種新奇的餘興節目。嚴肅的主題（如法國移民問題，不久以後一個名爲「城邦」(*Cité*)的移民博物館即將在巴黎市開幕——而且就在原來殖民博物館的舊址）或是無聊的主題都沒關係，重要的是最後都要在「現在」與「過去」之間形成一種漂浮、穩定的連續體，以便能夠把「現在」與「未來」（烏托邦、偉大計畫和末日神話的未來）**切斷**(*débranchement*)關係。身段柔軟的記憶、流動的、取代的和經常復位的記憶、折衷和不再幻想的記憶，根本就是非常**犬儒**(*cynique*)的——其眼界不是「真相」，而是開發利用以增其價

3 譯按：作者將*intéressant*放置於引號裡，有保留其多義的用意，同時指有趣味的、引人注目的、值得關心的，想出風頭的，當然還有有好處以及有利可圖的意思。

值，在「現在」深耕經營「過去」而已。隨手舉個後一歷史趨勢**矯揉造作**(sophistication)的例子。法國是這樣的一個國家：有著大批席哈克派的國會議員足以在國民大會投票通過一條法律向「過去殖民化的積極面向」致意，並將此條款明訂於中小學教學綱領中，但另一方面這個國家的總統卻在訪問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昔日法國移民地——的時候，有能耐譴責「殖民系統的偏航」和殖民的屠殺。法國又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剛剛出版了第一本由教師與歷史學家和他們德國的同行，為兩國學生共同撰寫的當代歷史教科書，但另一方面，其國鐵公司(SNCF)的員工在二次大戰期間，心甘情願地協助押解猶太人和被判放逐的政治犯到集中營，60年後卻完全拒絕承認此一罪行應負任何的責任。最後，附帶一提，法國還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具有強而有力行政體系的法國國鐵公司，因一個以前遭受流放迫害的猶太家庭的控告而被傳喚到法院，國鐵公司卻懂得聘請阿諾·克拉斯斐德(Arno Klarsfeld)擔任辯護律師，這位律師的父親比特·克拉斯斐德(Beate Klarsfeld)曾是個知名律師，他最受矚目的作為是建立了一張張的猶太人受難者名單，受難者都是在法國境內的德國占領區被逮捕並運送到集中營的猶太人，因這份長長名單出爐，人們得以重新揭發維琪政權當局所建立的「猶太檔案」。

這就是我為何名之為犬儒主義，一種後一歷史虛無主義的學生兄弟。但問題是彼此之間無法分離，在一個像我的國家這樣的國家裡，雖然必須付出野蠻粗鄙用法的代價，我們還是要稱之為**集體記憶的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ation de la mémoire collective)。